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四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〇八期 ——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107c）

【回首文革】	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最后十小时	舒 云
【书刊评论】	中共历史的见证——读程光《历史的回顾—— 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丁凯文
【一家之言】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金冲及
【百家争鸣】	金冲及先生误读文革	陶世龙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回首文革】

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的最后十小时

• 舒 云 •

从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来说，直到他驾机平安降落山海关机场，在飞行后会议上安排第二天早上6时起床，6时半吃饭……，一切还都是正常状态。可是为什么机组睡了以后全变了，潘景寅只叫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机组其他人？致使256三叉戟再次起飞时机组不全，只有他一个人带着三个机械师就上了天。本文试图还原潘景寅最后十小时的行踪，以此回答种种疑问。

为搞清整个事件的过程，要往前追溯一段。

—

林立果（林彪儿子、空军司办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慌张行动是从得知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开始的。林立果虽然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他在南方暗杀毛泽东的计划流产，但并没有太慌张。因为毛泽东可能在济南、天津等地停留，林立果认为自己还有时间。所以虽

然林立果有“南下”（第二方案）或“北上”（第三方案）的计划，但此时并没有启动。

9月12日12时10分，空军学院将军楼还一切正常，陈伦和（空司翻译，负责给林立果翻译资料）向王兰义（空军学院行政处处长，负责将军楼生活）要了11人的午饭，要求12时30分准备好。三位首长的饭送到将军楼，其余人到食堂吃。

14时多，王兰义陪来食堂的陈伦和等人吃完饭，把他们送回将军楼。

不久陈伦和打电话要给李伟信（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林立果“秘书”）派车，说进城买东西。

15时10分左右，林立果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一切都变了。

王兰义骑自行车到将军楼，告诉陈伦和车派好了，停在马路边。陈伦和你回去吧，李伟信自己会去开车。王兰义还没走出几步，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很急。王兰义赶快让路，所以他清楚地看见司机周宇驰（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副司机于新野（空司办公室处长），林立果坐在后面。伏尔加飞驰而去，周宇驰回头甩了一句：啊，老王。

王兰义注意到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个人的表情都十分紧张。事后想，他们肯定是得到了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否则不会如此紧张！

王兰义继续向将军楼方向走了200米，程洪珍（空司一处秘书，林立果“秘书”）驾驶另一辆伏尔加迎面过来。王兰义注意到程洪珍拉着个脸，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

林立果等三人驱车去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林立果与在北戴河的叶群通了电话，决心启动“南下”广州的第二方案。兵分两路，林立果立即飞北戴河，第二天早上携林彪、叶群南逃广州。周宇驰留在北京总负责，由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组织空军司令部有关人员拉个名单，分发武器，明早从西郊机场飞往广州。同时“通知”黄吴李邱一起走，如果黄吴李邱不从，就绑架他们到广州。

16时30分左右，周宇驰打电话给胡萍（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航空兵34师党委书记），叫他到西郊机场来。胡萍正在空军总院住院，十几分钟后他坐车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

周宇驰开门见山：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9月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胡萍并不觉得突然。9月8日晚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要回北京，让准备五架飞机。过去都是这样，林彪出动都是五架飞机，一架林彪坐，一架随行人员，一架拉电影机和电影片子，一架拉警卫人员，一架拉汽车。

胡萍为什么会听从周宇驰的命令，这不是颠倒上下级关系了吗？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周宇驰是吴法宪派去辅佐林立果的“师傅”，不离林立果左右。所以周宇驰的命令并不是周宇驰个人的，而是林立果，甚至林彪的命令，胡萍能不言听计从吗？

根据以往经验，胡萍知道，专机一向只说大概时间，什么时候首长到机场了，什么时候才是起飞时间。所以前几天研究好的林彪机组在这个星期天全部在位。

9月6日，256三叉戟改装完成。

9月7日，潘景寅试飞长春，接回了在长春的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潘鹭。

9月8日晚，胡萍和潘景寅研究了林彪机组名单。师副政委潘景寅担任机长，团副参谋长陈联柄任第一副驾驶，三叉戟中队长康廷梓任第二副驾驶，团领航主任李成昌任领航员，团通信副主任陈松鹤任通信员，机务分队中队长李平和机械师张延奎任机械师，特设分队副中队长邵起良任特设师，还配了空中服务员魏秀玲。各行业都是挑全师技术最好的，而且还多配了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机械师。

潘景寅、陈联柄、李成昌、李平、邵起良五人住在西郊机场，可以随叫随到。而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和机械师张延奎家在城里，周六晚上已经通知他们留在西郊机场值班。通信员陈松鹤住在空军学院，距离西郊机场几步之遥，而且他刚从阿尔巴尼亚执行任务回来，就放他回了家。9月12日空军学院组织秋游八达岭，陈松鹤准备带夫人和两个儿子参加。还没有走来了电话，要他立即到西郊机场。

三

接到周宇驰的起飞命令，胡萍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

没有飞行的时候，潘景寅在西郊机场的生活是两点一线，办公室和家。虽说是星期日，潘景寅也并不在家里呆着，他嫌孩子闹，总是到办公室看书学习，也练练字。可是胡萍打到潘景寅的办公室，没有人。打到潘景寅家里，老潘家属孙祥凝说老潘拿着一堆书报出门了。师值班室也不知道潘副政委去了哪里。

胡萍有些生气，明明说待好命，怎么人也找不到了？

此时，潘景寅正在机场里的理发室理发。

原来，潘景寅看了一会儿书，觉得很累。他刚飞行回来，疲劳还没有完全恢复。他怕夜里再有飞行，就想抓紧时间睡上一觉。于是，服了三片安眠药，到理发室理发，然后回家睡觉。

没想到飞行任务来了！

胡萍通知潘景寅立即做好飞行准备，并亲自驾驶256三叉戟，19时送林立果去北戴河。

潘景寅匆匆回家，顾不上吃饭，拿起飞行包就往外走。临出门，潘景寅说今晚可能回来。对于飞机来说，北京到山海关太近了，飞一趟也就40分钟，专机一般都是“卸下”首长就返回，不在山海关过夜。

正是晚饭时间，100团三大队值班员通知林彪机组立即到候机室。李成昌接到命令，放下饭碗跑步到飞行员宿舍，换飞行服。床上乱七八糟，李成昌也顾得上收拾。哪知这一去，就与飞行员宿舍再了见。

18时，康廷梓到空勤灶吃晚饭。他打上蒸饺，还没有吃，大队值班员就来通知他，有紧急任务。康廷梓放下饭碗，就往宿舍跑，迎面碰上机械师李平。李平说：康中队长，潘副政委让加16吨油。因为胡萍告诉潘景寅，第二天一早飞广州，所以潘景寅要求李平加16吨油。

可是康廷梓不知道，他想加这么多油干什么？这个油量可以从北京飞到广州。我们不是去山海关吗？接林彪回北京过国庆节，来回12吨油就够了。

康廷梓跑进飞行员宿舍，换上皮鞋，拿了飞行包，还多拿了一条棉毛裤。然后他跑到100团值班室。第一副驾驶陈联柄、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都已经到了。康廷梓把加了16吨油的疑问告诉了第一副驾驶陈联柄。

潘景寅夹着小包也进来了，说你们上值班室要车上机场。三叉戟256号的飞行任务要准备好，任务要保密。康廷梓提醒他，今天的飞行手续还没有办。潘景寅肯定地说，不办了。因为重要的专机任务保密严格，机组人员谁也没有再提疑问。

康廷梓注意到潘景寅神色正常。

这时机组人员坐上汽车到停机坪。

机械师李平迎上来，对潘景寅说，油车没油了，只加到15吨。

陈联柄问：加这么多油干什么？

潘景寅没有说话，也没有要求再加油。看来，潘景寅对即将要执行的任务也不是那么清楚。否则他会让李平再要油车，补上那一吨油的。

四

18时，胡萍给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打电话，告诉他三叉戟256号今晚19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代号252（256是专机，252是普通多座客机，发训练预报故意不报专机号，主要是为了首长安全，这在专机飞行中是常见的。但九一三事件后成了胡萍罪行）。然后胡萍打电话给派驻山海关机场的李海彬（空34师西郊机场航行调度室主任），告诉他今晚起飞的三叉戟是256，使用252代号，你知道就行了。

19时，256三叉戟并没有起飞。

机组九人在机场等候，潘景寅叫空勤灶把饭送到候机室。机组吃完饭，又等了好一会儿，陈伦和开着一辆蓝色伏尔加快速驶到256三叉戟跟前。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卸下一堆箱包，留在原地看守。蓝色伏尔加走错了路，从飞机左翅膀下飞快钻出来，吓了康廷梓一大跳。很快蓝色伏尔加又回来了，林立果下车，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程洪珍带两个十八、九岁的女兵也下了车，两个女兵的新军衣显得有些肥大。

陈伦和又卸下一堆箱包。大小20多个。这些箱包除了刘沛丰随身带的四个包，在山海关机场都没有卸下来。也就是说，这些箱包随机到了温都尔汗。如果没有烧毁，这些箱包都被蒙古或苏联人拿走了，而中国人没有从坠机现场拿走一件东西。

林立果向陈伦和交代一番，让他把蓝色伏尔加开走了。

五

34师100团政委安治梁和团参谋长李克修前来送行。按规定，专机起飞100团领导

必须到场。因为团长陈晋忠到苏联接飞机去了，所以政委安治梁和参谋长李克修来送行。九一三事件后安治梁和李克修都因此被关起来，安治梁被关了整整八年。

潘景寅任100团团长时，与政委安治梁搭档，彼此配合很愉快。潘景寅对安治梁说：老安，我吃了三片安眠药，原想抓紧睡一觉，没想到有任务。

安治梁嘱咐陈联柄，在必要时关照一下。

19时30分左右，林立果等五人上了256三叉戟。

19时40分，天已经黑了，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

这是256三叉戟改装后第一次正式飞行。

潘景寅驾驶飞机，起飞时倾斜度大了些。飞机抖动不已，桌上茶杯滑下来，摔碎了一两个。两个女兵很少坐飞机，以为要摔了，吓得够呛。康廷梓说摔茶杯是服务员魏秀玲没有固定好，飞行后讲评小魏还作了检讨。

到山海关是短途飞行，始终是潘景寅驾驶飞机。

潘景寅并没有对陈联柄说他吃了安眠药。但陈联柄有政委安治梁的嘱托，坐在副座上眼睛一眨不眨。驾驶室没有康廷梓的位置，他坐在机舱里东张西望。林立果非常敏感，他正与刘沛丰说话，发现康廷梓注意他，立即不说话了。康廷梓感觉林立果表情沉重，眼神似乎还有一丝凶光。

六

快到山海关机场了，林立果向程洪珍交代：明天早晨7时，首长要和“协和号”（黄永胜）通电话，你要把机场的保密机准备好。电话保证不好，你要负责！林立果的口气有些威胁，林立果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说过话，程洪珍吓得连连点头。林立果说：下飞机后，要了解一下飞机维护、加油、警卫等情况，这些你当秘书应当懂得。还有给张某某、袁某某（两个女兵）每人一支手枪，找个没人的地方教她俩使用一下，明天让她们上北京来的伊尔-18飞机，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你和她们把我的行李归拢一下，免得明天和“子爵号”（叶群）的东西弄混了。现在一切行动要听我指挥。

程洪珍的工作是保管文件，对外联络。上飞机前他一直忙着给林立果收拾行李，连自己的牙具都忘了带，也没有和对象告个别。26岁的林立果没有当过“首长”，27岁的程洪珍也没有当过“秘书”，两人关系有些微妙。有时林立果把程洪珍骂得狗血喷头，而有时又很亲热，亲自给程洪珍介绍对象，单在上海就给他介绍了12个，程洪珍一个也没有看上，说我是“康曼德”（林立果）身边的人，找个对象不像样，怎么说得过去？这不是丢康曼德的脸吗？最后林立果把选来的四颗“种子”之一赏赐给程洪珍，程洪珍这才热恋起来。这次匆忙去北戴河，光忙林立果的事了，也没有打电话和对象说一声。程洪珍有些丧气，但在林立果面前不敢有半句怨言。

刘沛丰避开机组人员，塞给程洪珍两把手枪。

20时15分，256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平安落地。

林立果以首长的身份走进驾驶舱，与机组每个人握手，说：“明天首长也要坐这架飞机。人民解放军战士要听林副主席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我代表首长谢谢大家。”

刘沛丰提着四个包，和林立果下了飞机。没人接，林立果等不及与北戴河联系，开着机场的吉普车走了。

七

程洪珍和两个女兵把林立果的20多个箱包归拢到一起后，也下了飞机。因为第二天还要坐飞机，两个女兵没有拿军用挎包。后来程洪珍发枪，两个女兵没有地方放，又返回飞机拿军用挎包。这时机组九人还在做飞行后例行检查。

康廷梓帮助机械师张延奎往发动机加润滑油。他听见潘景寅对李平说：待会儿把油加到17吨。康廷梓原以为首长明天飞回北京，现在又加这么多油，不一定是回北京了。他就插了一句话：加这么多油，明天到哪里？

潘景寅所答非所问：一会儿我们研究一下航线。

李平去安排加油。因为三叉戟1970年从巴基斯坦引进中国，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加过油，油嘴不配套。不能用先进的压力加油。只能由机械师爬到机翼上，用重力加油。这种加油很慢，所以潘景寅没有再坚持，说那就不加了，明早再说。

21时多，机组九人塞好了飞机的“眼”，最后由机械师锁上飞机，将飞机交给山海关机场的警卫人员。然后机组九人一起到空勤灶吃饭。程洪珍身边放着一个精致的手提皮箱，他和两个女兵快吃完饭了。中队长康廷梓分配房间。潘景寅是师级干部，被安排在单独的高干房间。服务员小魏和那两个女兵住在一起。剩下机组七人住在机场的一栋平房里。

房间是康廷梓分配的：最东边一间由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占领，既是他的宿舍，也是调度室，里面有三部电话。每年夏天只要林彪到北戴河，空军34师就专门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负责调度。

程洪珍住在平房东边第二间；第三间分给三个机械师：李平、邵起良和张延奎；第四间是第二副驾驶康廷梓与领航员李成昌；第五间是第一副驾驶陈联炳和通信员陈松鹤。

房间安排好，不一会儿潘景寅来了，在机械师房间召集机组进行飞行后讲评。康廷梓问：“到现在航线还不知道，明天怎么看天气？”潘景寅说：“咱们不用管，空军航行局都掌握，听他们的。”然后潘景寅交代：“明天6时起床，6时半吃饭，然后到机场准备飞机，抓紧时间睡觉吧。”

23时多，机组八人都关灯休息了，只有潘景寅一人没有睡，他在李海彬的调度室兼宿舍里，连着接了几个电话。

八

潘景寅最后的言行只有程洪珍和李海彬知道。

程洪珍吃完晚餐，先到两个女兵的宿舍，准备教她们使用手枪。两个女兵说陈伦和已经教过她们。程洪珍向她们传达了林立果的指示：明天还有一架飞机来这里，是周（宇驰）副主任坐的伊尔—18。明早上走时，你们可能上那架飞机，也可能上这架三叉戟。如果上三叉戟，听李伟信指挥。今天听我指挥。

20时多，程洪珍来到李海彬的调度室，他遵照林立果的命令检查保密机。潘景寅正在和李海彬了解天气情况。

调度室除了机场内部电话，还有两台专线保密机，一台通北京，一台通北戴河96号楼（林彪别墅）。

程洪珍用保密机进行了通话试验，声音清晰。

程洪珍问潘景寅：飞机维护好了吗？

潘景寅肯定地说：维护好了，不会有问题。

程洪珍又问：飞机警卫好了吗？

潘景寅笑着说：这个你放心，机场的人可聪明了，看到什么飞机来了，就知道派什么人警卫。

程洪珍觉得一切安排好了，就回房间睡觉。

他睡得正香，突然被潘景寅和李海彬叫醒……

九

潘景寅坐在李海彬的调度室里，除接了几个电话，就是抽烟，留下满满一缸烟灰。

潘景寅不走，李海彬也不能睡觉，陪他坐着。

那天半夜，只有潘景寅和李海彬两个人坐在调度室里。潘景寅是个话极少的人，而李海彬在自己的上级面前，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潘景寅接电话，李海彬听不见电话机里的声音，从潘景寅的只言片语里，也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北京方面反复查问256三叉戟，李海彬感觉到了异常。

九一三事件后，李海彬成了“重点案犯”。空军34师只有两个人被关进秦城监狱，一个是陈士印（空军34师副大队长，周宇驰劫持的直升机上幸存的飞行员），另一个就是李海彬。1980年陈士印被免于起诉，李海彬被无罪释放。

也许到现在，李海彬也说不清楚潘景寅为什么“赖”在调度室。是啊，潘景寅明明知道第二天一大早还要飞行，为什么熬夜呢？是一个又一个的电话，把潘景寅“锁”住了？

十

22时30分左右，林彪女儿林豆豆关于林立果、叶群要挟持林彪的报告，通过8341

部队二大队，报到周恩来那里。因为飞机是空军的，机场是海军的，周恩来分别打电话给吴法宪和李作鹏，了解256三叉戟的情况。

23时05分，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指挥室打电话，证实256三叉戟还在山海关机场。

23时左右，吴法宪打电话给胡萍，说今晚到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你们怎么搞的？

吴法宪和李作鹏先后报告周恩来，确实有一架三叉戟停在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对吴法宪说：你通知这架三叉戟立即飞回北京。

胡萍从候机室回到自己房间，给周宇驰打了一个电话，说总理正在查问去山海关的三叉戟。

胡萍回到候机室，用保密机与潘景寅通话。胡萍说：吴司令两次查问256三叉戟，要你们回来。你就说试飞。问谁安排的，你就说你们自己安排的，我不知道。如果训练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你听明白了吗？李海彬只听见潘景寅连声说“好的，好的”，最后说了一句“明白”。

有了胡萍这个电话，潘景寅还能睡觉吗？

吴法宪报告周恩来，说三叉戟有故障，正在修理。

周恩来说：飞机修好后立即回来，回北京时不准带任何人。

吴法宪向周恩来要求亲自到西郊机场处理。

23时左右，吴法宪带秘书来到西郊机场候机室。胡萍让34师服务队孙副队长通知正在工字房里的周宇驰，告诉他吴法宪到西郊机场来了。

23时22分，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说他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同志。叶群劝他不要来，说林彪同志要动一动，周恩来说夜里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晚上不飞，明天早上飞。

23时30分，林彪对内勤说去大连。

23时35分，李作鹏再次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说这架飞机的行动，听北京总理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

23时40分，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北上”。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到林彪房间。

23时44分，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了解飞机号码。（答256），请示李（海彬）主任，又改成252。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的这几个电话，潘景寅也知道。

吴法宪、李作鹏都查问256三叉戟，周总理又让256三叉戟返回，这是为什么？这是林彪的飞机啊？这个时候，潘景寅只能听林立果，听林立果就是听林彪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吴法宪不断写检讨，林立果在空军搞以吴法宪划线。在胡萍和潘景寅眼中，吴法宪是“敌人”。这个背景似乎非常重要。

23时45分，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到8341部队二大队部报告，林彪马上要走。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长姜作寿商量，决定让副大队长于仁堂带几个人乘吉普车到山海关机场，不让飞机起飞（虽然吉普车比“大红旗”早走10分钟左右，但半路还是被“大红旗”超过）。

23时50分，林彪别墅乱了，叶群大喊要车。……

十一

23时54分左右，潘景寅在李海彬调度室接到北京保密机打来的加油电话。李海彬的材料显示，是胡萍打的。李海彬并不知道谁打来的电话，根据经验判断，认为是胡萍打的加油电话。

如果是北京保密机，打电话的人不一定是胡萍，而可能是周宇驰。为什么胡萍不可能打这个加油电话？因为周恩来查飞机后，胡萍只给周宇驰打过一次电话，后来两次报信，都是胡萍通过服务队孙副队长跑到工字房，当面告诉周宇驰的。胡萍通过孙副队长告诉周宇驰，他现在打电话不方便。尤其后来吴法宪到了西郊机场候机室，胡萍吓坏了，直用手抹脖子。在这种情况下，午夜这个加油电话应该不是胡萍打的。极有可能是周宇驰给潘景寅打的加油电话。

因为一，林立果给周宇驰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北上”，要他也带北京的人“北上”。连夜走，肯定要加油，这时林立果急得团团转，而周宇驰还有周旋的时间。因为二，周宇驰和潘景寅以前同是空军一航校宣传科干事，都参加了选飞。潘选上了，周因身体不合格淘汰。因为三，256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就是周宇驰把胡萍叫到西郊机场工字房下达的命令，同时下达准备五架飞机，第二天和256三叉戟一起飞广州。而周宇驰已经知道胡萍被“困”住了，当然会直接给潘景寅下令。

林彪别墅有直通李海彬调度室的专线电话，林立果当然可以直接与潘景寅通话。但按一般情况，林立果不可能给潘景寅打加油电话，因为一，林立果是“首长”，加油这些具体事是手下人的工作。因为二，林立果和潘景寅的关系，不如周宇驰与潘景寅的关系“铁”。因为三，林立果此时“火”上了房，哪里顾得上加油这样的“小事”！

不过可以肯定，潘景寅接到加油电话，并没有说马上走。因为林立果和周宇驰林都不知道专机起飞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虽然周宇驰学会驾驶直升机，但那都是机组“保姆”式的服务，一切都安排好了才让他上机。所以他们以为飞机像汽车一样，只是加上油，说走就可以走。

十二

潘景寅接到北京保密机的加油电话，还是好的……好的……明白。放下电话，潘景寅命令李海彬要油车给256三叉戟加油。李海彬问：加多少？潘景寅说：加两吨半。李海彬说：那要一个油车就够了。潘景寅说：你要两个吧。潘景寅怕油车的油不够，别又像西郊机场油车没有油，所以要两个油车。

23时55分，李海彬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要两个油车给三叉戟加油。与此同时，潘景寅出门，叫机械师加油。

23时56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告诉外场，两个油车加油，化验员也到场。

如果潘景寅接到的加油电话说立即起飞，恐怕潘景寅会叫机组都起来。但是只说加油，潘景寅以为首长上飞机还早着呢。尤其要注意潘景寅和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的关系有些僵硬。潘陈是同是1947年兵，而潘进步快，职务比陈高了两级！陈联柄嘴边有时没有“哨兵”，但飞行技术比潘景寅好，所以他不怎么把潘景寅放在眼里。

而潘景寅也很小心处理与陈联柄的关系。

在西郊机场说19时飞，17时多一点就紧急进了机场，害得大家连晚饭也没有吃好，而偏偏等到19时40分才起飞。临睡前潘景寅说第二天早上飞，现在只是通知加油，并没有说半夜飞。即使给了起飞时间，首长到机场只会推后，不会提前，潘景寅怎么可能把机组全叫起来“陪绑”？

23时55分左右，林彪内勤陈占照打电话到8341部队二大队部，说（林彪）他们走了。……

十三

零时3分，潘景寅仍在李海彬调度室。李海彬已经要了两个油车，潘景寅也叫三个机械师去给飞机加油，再没什么事了。

突然北戴河保密电话响起，李海彬拿起电话。一个男声急促地说：“我是8341部队的宋定忠，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说完就挂了。

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让李海彬不知所措。他问潘景寅，潘不知道这个叫“宋定忠”的人，“卡住小轿车”？当时能坐小轿车的人只能是首长，“卡住”首长？谁如此胆大包天？李海彬搞不清楚，潘景寅也搞不清楚。他们一起敲开程洪珍的门，而睡意正浓的程洪珍也不认识这个宋定忠。

宋定忠是谁？8341部队二大队有两个中队在北戴河警卫林彪，六中队跟着二大队部，负责林彪别墅外围警卫。八中队是更外围的警卫。可是当年8341部队二大队没有宋定忠这个人！

电话里李海彬没有核实姓名，对方有口音，李海彬听差了。但宋定忠这个电话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8341部队派了好几辆车追到山海关，当时包括8341部队二大队的说法都是林立果绑架了林彪。在山海关机场，没上飞机的机组成员清楚地听到有人大喊抓“小林贼”。

但是，中央并没有给8341部队明确命令，没有说阻止林彪上飞机，只是不让飞机起飞。否则按8341部队当事者的话，十个林彪也跑不掉。

无论如何，宋定忠这个电话把程洪珍也吓住了。“卡住”林彪的车？为什么？程洪珍、潘景寅、李海彬都认为这个电话很严重，必须立即报告林立果。三个人回到李海彬调度室，程洪珍用北戴河保密电话打给林立果，没有人接！程洪珍又用北京保密机通过空军一号台给周宇驰挂电话，周宇驰急促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康曼德”（林立果）已经出发了。现在情况紧急，北京正在追查，你快跟他们跑吧！

程洪珍急忙与潘景寅商量。程洪珍怎么说的，是原原本本重复周宇驰电话里的内容，还是“偷工减料”只说林立果已经坐小车往机场来了，只有李海彬能说清楚。

李海彬说了一句，是不是接着程洪珍的话，还是之前说的，有待考证。李海彬说：空军司令部调度室问了好几遍了，这架飞机（2 5 6 三叉戟）什么时候回北京？

潘景寅气冲冲地说：老问干什么呀，就说还没有走！

十四

零时 1 8 分，林彪专车以极速闯进山海关机场。

零时 2 0 分左右，林彪专车在 2 5 6 三叉戟跟前来了个急刹车。李海彬调度室距离停机坪 1 0 0 米左右，因平房前面还有一座小楼挡着，潘景寅看不见飞机和汽车。但是夜间声音传得很远。程洪珍、潘景寅、李海彬都听见了刺耳的汽车刹车声。

潘景寅二话不说，就往外跑，越跑速度越快。

李海彬没动，他的岗位在调度室，他要 2 4 小时守候电话。

程洪珍呢？他跟着潘景寅也往门外跑。绕过小楼，程洪珍清楚地看见 2 5 6 三叉戟右机翼上站着两名机械师，正在加油。但是，程洪珍被机场乱糟糟的场面吓住了，他不由自主停下脚步。林立果交代听他指令，现在林立果半夜来了，没有给他指令，他是该上飞机呢，还是不该上？如果冒失跑上飞机，林立果问那两个女兵呢？不是叫你守电话吗？谁叫你上飞机？想到可能要挨林立果的骂，程洪珍突然害怕起来，停住了脚步。

林彪专车还没有停稳，叶群披头散发，第一个跳下车，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现在有情况。林彪没戴帽子，第二个下车。林立果也下了车，挥舞手枪乱叫，快快快……刘沛丰顺着工作便梯爬上飞机，叶群第二个，林彪第三个，林彪的头顶到了叶群脚。林彪下边是司机杨振刚，他托了林彪一把（以后这成了杨振刚的罪行，被开除党籍，全家赶回河北农村）。叶群进到机舱（这时飞机还没有发动），向下边大喊：油车快让开，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主席！

零时 2 0 分，山海关机场潘站长又和李作鹏通话，问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指示直接报告周总理。潘站长又问，是否可以告诉空军 3 4 师潘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零时 2 1 分，佟玉春（山海关场站参谋长）跑步去通知潘景寅。他跑到潘景寅宿舍，没有人。此时潘景寅已经上了飞机。

8 3 4 1 部队的吉普车也跟进了机场。机场灯没有打开，只有飞机附近亮着一盏聚光灯，这是警卫飞机的长明灯。他们的车没敢到 2 5 6 三叉戟跟前，而距离飞机 2 0 0 米停下，于仁堂（8 3 4 1 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往调度室跑，告诉调度室阻止飞机起飞。

三个机械师中，李平和张延奎正站在飞机右机翼上加油，特设师郅起良在机舱里检查仪表。郅起良看见林彪、叶群都上了飞机，而机组还差好几个人，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说首长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有来？

零时 2 1 分左右，调度室主任李海彬挨个砸机组的房门，大喊首长到机场了。机组几个人

被惊醒，慌忙穿衣服。

零时22分，李海彬通知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马上准备。

零时23分，窗外“轰”的一声巨响，256号三叉戟发动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记录：开车就走，来不及准备。通信员陈松鹤跑在最前面，后面跟着第一副驾驶陈联柄，……

十五

8341部队副大队长于仁堂距离飞机30米时，256三叉戟滑动了。于副大队长急了，又转身往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跑，对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说：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起飞，你要采取紧急措施。

佟玉春说：我们也接到了命令，不让这架飞机起飞，可现在来不及了。佟玉春一边朝飞机方向跑，一边掏出手枪，冲天打了三枪。

这时，机场的灯全熄灭了，黑暗中只有飞机的轰鸣声。

256三叉戟的右机翼撞上油车，刮坏了右机翼灯，仍继续前进。拐弯时，一侧轮子偏离了水泥路面，把跑道边的土地犁了深深一道沟。潘景寅不熟悉山海关机场的跑道地形，跑道一侧有一堆修跑道剩下的石头堆，潘景寅驾着飞机冲着石头堆就去了。如果撞上石头堆，肯定机毁，但不一定人亡。潘景寅使了吃奶的劲，把飞机轮子强扭了一个近90度的角，硬扭开了石头堆，把飞机扭进跑道。

零时28分，山海关机场副站长赵雅辉给李作鹏打电话，报告飞机强行滑出。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赵副站长说：快到跑道了。

零时32分，256三叉戟加大油门，冲上西南方向的天空。剩下目瞪口呆的五名机组成员：第一副驾驶陈联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领航员李成昌，通信员陈松鹤，空中服务员魏秀玲。

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报告丹江（空军）注意。陈联柄等机组五人还未上飞机，报告李海彬。

零时45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记录，飞机290度，75公里，场站政委潘浩报告李作鹏政委。

十六

256三叉戟强行起飞，先向西南240度，然后右转，航向270度到280度。本来转30度只要几十秒，潘景寅却飞了四分钟。然后飞机又用了四分钟向北转弯，到了310度，还在转，转到345度，过了，又回到325度。

这时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在山海关机场和北京之间的河北省迁安县（潘景寅老家）上空，高度3000米。偏离航线130公里，这是很不正常的。

2时27分，256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过去都说2时30分，蒙古搜集的机上人员的一块停摆手表，指针在2时27分，这应该是坠毁时间）。

林彪飞机落地时速度过快，潘景寅没有打开减速装置。飞机又被弹起来，再摔下，翻了个身，右翼翻到左翼去了。机上九人分成三组，被甩了出来。尾部是林立果、刘沛丰和林彪司机杨振刚。中间是三个机械师成半圆，围着林彪。机头是叶群和潘景寅。

从面部表情看，林立果在甩出时还有气，他的一只手摸着腰上的枪，面部狰狞。

潘景寅在被甩出时也没有死，但肯定烧伤了。他的面部表情非常痛苦，两只手伸向前方，似乎爬了一段，最后还是心有不甘地咽了气。也许他最后想到了他的三个孩子，12岁的患小儿麻痹的大女儿，11岁的二女儿和刚刚两岁的小儿子。

~~~~~

## 【书刊评论】

中共历史的见证——读程光《历史的回顾——  
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 丁凯文 •

继今年2月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了程光先生的《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之后，4月份又推出了该书的姊妹篇——《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在这部以问答方式针对中共党史上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讨论的口述历史中，邱会作将其亲身经历事件娓娓道来，向人们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此书共489页，从邱会作早年参加革命谈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是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共历史、中共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深刻认识中共本身的重要历史见证。此书内容丰富，史料详实，可读性很强。读罢此书，笔者感慨良多，写出来与读者分享。

### 一、革命也会革到自己的头上——苏区的肃反

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记得毛泽东的一句名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究其本意，大约是指只要是在“革命”的口号下，在“革命”名义的驱使下，任何行为都是合理的，“革命”的对象不仅针对敌人，同样也可针对自己的同事。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这一“革命”达到了巅峰，致使数亿中国人卷入这场毫无来由的“革命”运动之中。然而，人们也许有所不知的是，这一“革命”行动早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就在中共自己的领域范围内大搞特搞，杀人无数，中共在革敌人的命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革着自己人的命。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关于这段历史，邱会作说：“我们部队的肃反就是抓‘AB团’，运动在1930年12月发生的‘富田事件’时达到了高潮。在那次事件前后，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内部错杀了一大批无辜的人。……当时主要的矛头是对准干部，特别是领兵的干部。运动开始，八连政委就被抓走了，没几天，我们的二排长也不见了，不久又有几个班长没了，说他们都是‘AB团’，被抓走杀了。”“处决人的场地离我们的住地有十里路远，每天都有打成‘AB团’的人被绑到那去执行死刑。”“有一次我到上级机关去送信，回来的路上又看到别的部队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人死刑前喊叫，事先用小树棍横在他们嘴里，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我们那天在河滩上见到的更残酷。为了节约子弹，执行人把要杀的人绑起后推倒在地，用大石头砸‘犯人’的头，砸得脑浆四溅……”（程光《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页19—21，以下简称《回顾》）

中共不仅在下级指战员中大杀特杀所谓的“AB团”，而且还杀了许多高级指挥员。邱会作的堂兄也不能幸免。邱会作的远房堂兄邱会培，1925年就参加了共产党，1926年任江苏南通最早的党的书记，曾领导过工人运动在1927年回兴国闹革命，搞起了一支近两千匹马的队伍，亦曾迎接毛泽东、朱德下了井冈山。他当时是兴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也被当成“AB团”杀了。中共不仅杀了邱会培，甚至连他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女儿也一起杀了。（《回顾》，页21）

中共的这段历史可谓极为惨痛，中共不仅杀了许多中下级的指挥员，更使红军元气大伤，国民党办不到的事情，反而是共产党自己办了。如果说中共抓“AB团”的初衷还是针对国民党对中共的渗透，防止敌人从内部对中共的破坏，但其后来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滥杀无辜，走火入魔，把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权制度下最糟粕的“连坐”、“株九族”一类恶习搞到中共党内，有些甚至是公报私仇。由此贻害无穷。当然，邱会作当时并不太清楚“富田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实那就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大规模的清查AB团运动，以酷刑逼供等手段罗织罪名，滥杀无辜，终于引发了富田事变。事变之后，他在王明的支持下，对党内、军内的异己分子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清洗。可事后毛泽东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将这笔滥杀无辜的帐全部算到了王明的头上。此后，毛泽东党内斗争的手段日臻化境，炉火纯青，及至六十年代发动的文革这一疯狂“革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 二、毛泽东、张国焘的分裂和叶剑英

叶剑英是毛泽东文革当中相当倚重的军内代表人物，文革初期叶剑英在打倒罗瑞卿事件中出了大力，虽然在“二月逆流”之后靠边站，但是林彪事件后重掌军队大权，惟在毛泽东去世前又解除了叶剑英的军权。但毛死后叶剑英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关键人物。叶剑英之所以屡受毛泽东的重用，这与长征途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所起的所用分不开。由于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在1934年开始了“长征”，而在1935年6月在四川西北的懋功的两河口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向何处去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导致了红军的分裂。这一结果对中共后来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邱会作作为一个亲身见证者对此有详实的描述。

有关毛张分裂最关键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草地密电”。最早提出有张国焘要“危害中央”的“密电”一说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在1937年3月延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然而这一说法长期以来不为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所认同，日后更受到史学研究者的质疑。

对于当时的情景，邱会作对此回忆说：“1935年9月9日，叶剑英参谋长匆匆地从司令部那边到我们这儿来了，没多久，各位中央领导人被叫到毛主席那里，像是开会议事。我想一定是有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到这儿休整后很少有把所有领导人都叫去的。下午两点多的时候，通讯员急忙跑来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员那儿开紧急会议。我跑步赶到时，曾希圣（军委二局局长）、李富春、叶季壮（先遣工作团正副团长）、军委机关的肖向荣、孙开楚等人和我几乎同时到达。我见林伯渠心事重重地呆坐着在那儿。会议开始后林伯渠说，左路军到了阿坝，中央要他们迅速来和我们会合，一起北上。张国焘说没有粮食，河水大涨不能徒涉。他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态度非常强硬。中央刚才开了会，认为徐、陈会执行张国焘的命令。我们走为上计，行动要快。只要我们向林彪的一军团靠拢了就主动了。具体行动方案是：1、中央决定立即北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如不愿意走，我们就和红一军团、三军团北上；

2、行动前绝对保密，对外说是明天上山打粮，先不告诉红四方面军的人，让他们先跟着走。过了水磨房之后（那儿驻有红三十军部队和红军大学），再向他们宣布我们的行动，走留听从其便；3、对四方面军不愿走的人不准强迫、打骂；4、我们现在就秘密做准备，凌晨三时准时出发。”“我返回后立即召集三科开会，布置任务，分头去收帐篷、绑行李、装担子、备马、做饭，紧张的样子我历历在目，完全是受到威胁要立刻离去的紧急措施。有人发现这是大搬家的样子，对明天‘上山打粮’怀疑，在瞎猜乱问。我制止了，要大家坚决执行命令。准备之中，曾希圣找我商量，说他的通信部门要晚些时候才能收电话线，要我配合他。我问时间这么紧迫，为何如此拖拉。他说，是为了晚上行前要给叶参谋长打个电话，叫他过来一起走。……后来叶剑英对我说过，那天他回去就向徐向前、陈昌浩汇报了中央纵队明天‘上山打粮’的布置，他想到右路军只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肃南部的地图，在指挥部作战参谋吕冀熙那里。他派吕冀熙出去办点事，把地图偷偷拿到手。晚上，叶剑英接到曾希圣的电话，向徐向前、陈昌浩说，要去察看通讯设备的故障，脱身了。”（《回顾》，页80—82）

从邱会作这段回忆来看，叶剑英当时确实来到毛泽东处报告了张国焘的意向，即“停止北上，准备南下”，且“态度非常强硬”。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等人的紧张，随即采取断然措施，先行离开，尽快脱离张国焘所指挥的部队。但是如果说张国焘当时打算采取措施“武力解决”中央，显然也并非事实。日后众多的党史专家和学者们反复论证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指责并非事实求是，而是歪曲、夸大了事件的严重性，更为张国焘戴上了“分裂中央”的大帽子，日后很多红四方军的指挥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学者就此指出：“毛泽东的‘密电’之说，尽管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它为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定了性，纾解了人们在长征中因红军分裂产生的困惑，其目的还是为了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肃清不利的消极政治影响，维护团结和统一，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权威，以便迎接摆在党和人民军队面前的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新任务，这在当时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就免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群将要面临委屈和不公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夏宇立《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邱会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更有启发性。邱说：“人们过去常把怨恨记在叶剑英偷出来的那个‘密电’上了，争辩它的有无，其实人们的怨恨应该记在日后整人的错误政策上。如果没有因为张国焘而过分地整了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更多考虑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在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对那个‘密电’的有或无，就不会这么‘较真’了。现在我担心的是，在人为的‘路线斗争’和宗派观念的驱使下，会把历史上真实的东西扭曲，埋没了。”（《回顾》，页89）

由于叶剑英的这一“功劳”，毛泽东日后念念不忘，将叶剑英依为自己军内的心腹，称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即使叶剑英在文革中卷入“二月逆流”，被毛泽东下令“靠边站”，但是在九大上仍然保留了叶剑英的政治局委员一职，而其他老帅们则继续被毛泽东冷落。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后，叶剑英被毛泽东委派专门负责收集陈伯达早年的资料，为彻底打倒陈伯达做好各种准备，而叶剑英也确实不负毛望，为陈伯达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林彪事件后，叶剑英出掌军委办公会议，为毛掌管军队事宜。从这一点来看，叶剑英自有其历史上与毛泽东的渊源。然而，历史的诡异却是，叶剑英这个毛泽东的心腹却是日后粉碎“四人帮”的主要人物。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众叛亲离，最后只剩下毛一个孤家寡人以及妻子江青和那几个文革极左派。毛泽东一死，那些人立即被一网打尽，一朝覆亡。

### 三、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

国内官方在谈论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问题上，一概以邓小平钦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将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定为于“斗争”。该《决议》说：“他（周恩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由此，周林之间的关系的“斗争说”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看法。笔者曾撰文讨论这一问题（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

之比较研究》，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出版，2007年3月版）。笔者认为，文革期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恰恰时最融洽、最配合的时期，而这不仅源于他们早期的革命经历，更源于林彪自1959年接管军队后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工作的支持相关。而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时正逢三年大饥荒，国民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林彪作为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以自己的方式对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予以最大的支持。邱会作接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时，发现彭德怀时期军队结余了七十亿元军费。当年的七十亿元可是一个天文数字。邱会作当即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随后找邱会作谈了一次话。林彪说：“当前国家困难，应当把各方面的财力集中起来渡过难关，我考虑结余军费全部交给国务院。”邱会作向军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常委们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邱会作代表军委将军费上交一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很快就予以批准，并批示说“全党都来顾全大局，就能战胜困难。”（《回顾》，页372—373）

当邱会作把总后财务部的支票送交国务院财政部时，周恩来却压了下来，迟迟下不了决心。邱会作了解周恩来的难处，表示愿意帮周恩来想个办法处理好这件事。周恩来后来单独与邱会作谈了此事。周表示说：“彭德怀管事的时候，整天发我的脾气，把国务院指责得毫无是处。抗美援朝战争时，我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支援前线，他竟然说朝鲜打仗‘靠的是两个麻子’。现在军队由林总管，完全不一样了。国家遇见了这么大的灾荒，在大家都很难的时刻，林总主动把节余军费送上我的门来，支持国务院和我的工作。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令人感动！我这个当总理的，没把军队的事情办好，反而要把军队节省的钱收回来？于心不忍啊！”最后邱会作汇报了林彪的坚决态度，并出了个主意，建议财政部先把这笔钱收下，也不叫上缴，也不叫收回，按照银行条例转换为军队的存款。军队永远不提取，不收利息，实际上是送给国务院了。周恩来连称是个好办法（《回顾》，页373—374）当时财政部总也提不出一个合适的方法接收这笔款项，没想到邱会作一下子就为周恩来解决了难题。

据邱会作回忆，在林彪的指示下，军队对国务院的支持还很多。比如，粮食部和商业部决定在全国实行粮票布票制度。总后军需部害怕麻烦，主张军队干部不实行粮票制，实行特殊供应。邱不同意这样做，邱认为国家对军队已经很照顾了，军队干部供应的布多了好几尺（发的军衣不包括在内），粮食定量也高。但军队有人还要求有更多一些特殊照顾，一些重要领导也持这样的观点。但是，林彪支持了邱，林让邱对周恩来说，军队和地方一样，实行布票粮票制度。林彪还对军委办公会交代，现在把节余费用全部交出去了，以后花钱也要节省。一些不急于换装的装备，能暂时减缓更新的暂缓；已经研究成功的新产品，不到一定时机，暂不大批生产，把钱省下来让国家搞经济建设。（《回顾》，页374）

此外，林彪还建议解放军重提“拥政爱民”的口号，解放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地方政府的工作，由此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

国内官方多年以来的宣传，似乎林彪除了处心积虑吹捧毛泽东外，其他一无是处。而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与林彪之间也只能是“斗争”的关系。殊不知周恩来与林彪长期以来都是和睦、合作的，林彪掌管军队后更是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的支持，文革期间亦不例外。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最佳的说明。

#### 四、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五七指示”的来龙去脉

笔者文革期间还在上小学时就对毛泽东“五七指示”其中的一段背诵如流，“学生也是这样，



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时虽然并不太理解这些话的深刻含义，但是学校每年都要参加学工、学农劳动，并请解放军来校给学生作军训。小学、中学和大学都进驻了工宣队、军宣队，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所有这一切起源于这个“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源于邱会作写给中央军委和林彪的一份工作报告，邱会作向军委汇报了全军农副业生产的概况，用一些生动典型的事例表达了邱本人对军队从事生产劳动的想法和请示。林彪看后觉得不错，转呈毛泽东。毛看后给林彪写了长信，抒发了毛本人心目中的理想国和宏伟蓝图。毛的主要思想是：“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通过邱会作汇报的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毛泽东看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一个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太平天国”。从此，“五七指示”成为全中国的座右铭，各机关单位纷纷成立“五七干校”，广大人民群众都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而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各行各业都要与军队相结合，要批判资产阶级，要将中国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确如王年一教授所言：“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所向往、憧憬的社会。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呢？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经济、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小而全、封闭式的社会。毛泽东的构想，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4）

然而，站在邱会作的角度，邱会作认为，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后勤工作的肯定和褒扬。邱会作说：“1966年6月间，《解放军报》两个记者向我进行了采访，要我谈谈获得毛主席这么重要批示的原因。我说我们的报告没有政治空话，非常实际。我根本没有料到林总会把它呈报了毛主席。我更没有料到毛主席写下了这么重要的指示。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毛主席会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后勤业务报告上做这样大的一篇大文章呢？想来想去，那就是毛主席看到了我们的业务工作中有政治，是务实的政治，是联系实际的政治，是真正的突出政治。”（回顾》，页454—455）

## 五、罗瑞卿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内情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初起时军队内部发生的一次重大斗争。国内党史学界众口一词，均将这一斗争简单地归结为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而换取林彪得到支持，故而打倒了罗瑞卿。通过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终能窥得被大陆官方严密封锁的内幕。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值得我们特别予以关注。

第一、军队山头主义的影响。中共军队的组成有其历史的渊源，其中尤以林彪、贺龙、徐

向前为代表的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为主要“山头”。邱会作说：“红军中三个大‘山头’是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党在大革命时期培养积蓄的军事人才多在一方面军，有很多能人；其次是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干部数量多，来源多为农民。在党领导的革命各个时期，担任军事要职的人基本上是按一、二、四方面军排序。经过发展和演变，这三个山头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林彪、贺龙、徐向前了。从历史功绩、威望、能力来看，林彪、贺龙居前，徐向前因张国焘牵连，受了很大影响。”“解放后，军内有政治力量的大山头就剩下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其代表人物林彪、贺龙地位很高。红四方面军‘山头’很松散，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在1936年的西征中几乎全军覆灭，再加上张国焘到延安后叛变的影响，他们再也形不成有政治力量的高级干部群体了。因此，以后军队里能够和林彪相提并论的只有贺龙。”（《回顾》，页459）1959年彭德怀下台后，林彪、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直接体现了军内两大派系共掌军权的格局。然而，日后的矛盾也由此而生。

第二、林彪患病，军内产生的变局。1962年秋天，林彪患病严重，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对贺龙说“军队的工作，今后靠你了！”（《回顾》，页461）然而，毛泽东这句不经意的话却引出日后发生的矛盾。邱会作说：“但罗瑞卿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想得多，作得也多，个人决断、自作主张也多了。我在军委办公会上经常听到罗瑞卿说：‘林总身体不好，我们不能去干扰林总，去看望也是增加病人的负担。’罗瑞卿要求大家多向他请示工作，不能越过他去和林彪联系。”“人们对林彪的病情悲观，认为他再回来工作的可能很小。贺龙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和林彪不苟言笑，过于严肃相比，善于和下级搞好关系，好多人聚拢在他那里。贺龙年纪大，有许多老年病，主持军委的时间有限，但他对接班的人推荐的分量就重了。罗瑞卿和贺龙的关系迅速热了起来。”（《回顾》，页461—462）

林彪有病，难以主持军委工作，军队内部原有的格局产生了微妙变化。罗瑞卿等人言行上难免有所流露。邱会作说“罗瑞卿以往讲话，总是习惯带上一句，说林总如何如何指示。贺龙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罗就爱讲林彪的病，讲话经常带上如何关心林彪的身体，而且很生动。罗瑞卿把林彪的病情说得很重，要求大家不要打扰林彪，要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把好关。向林彪送文件、去汇报，要经过罗，对不经他同意就到林彪那儿去的人说成是‘干扰’，给予批评。”罗瑞卿甚至将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找来在会上介绍林彪的病情。邱会作说“贺龙、罗瑞卿在军队主政要有组织措施，但无论是收拢或是动林的人都不方便，如果在这上做手脚，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麻烦。而林彪的身体已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是可以说得出口的理由。”（《回顾》，页463）由此，军内两派人马的互动和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第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作用。历史上刘亚楼与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极为紧密。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怀接任国防部长，罗瑞卿和刘亚楼都是积极拥护者。林彪患病后，刘亚楼曾出面对林彪建议，要林安心养病，罗瑞卿为林彪管事。林彪今后超脱些，在中央以副主席的身份协助毛主席管军队，然后过渡到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但受到林彪的批评。林彪说“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只有毛主席才有权决定，你们这样不妥。你刘亚楼是聪明人，要知道深浅。”（《回顾》，页460—461）在林罗关系微妙之际，而刘亚楼又加在其中处境尴尬时，林彪针对空军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一事，在1963年春提出“全军向空军学习”，表示了对刘亚楼的信任。然而，罗瑞卿对此却不很积极。后来刘亚楼开始远离贺龙与罗瑞卿的活动，罗刘之间的关系也渐行渐远。邱会作说：“刘亚楼1964年患了肝癌，在他生病之时，林彪对他非常关心，刘亚楼在病危时说出了心里话，说他对罗瑞卿没有看清，和罗曾搞到一起了一段时间。从他认识林总以来，就这一次对不起林总，有些事他会有个交待。”日后叶群在倒罗会议上的发言所提及的“四条”也就是由此而来。邱说：“毛主席知道了，说：刘亚楼动身之前（死），把问题说清了，是一个好人。这样他到马克思那里就有共同语言了。”（《回顾》，页481）

第四、军中倒罗力量的兴起。军中一些老帅对罗瑞卿不满由来已久，尤以叶剑英、聂荣臻为甚。邱会作说：“1965年6月间的一天，军委常委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到的早了，一进门看见叶剑英和聂荣臻在空荡的会议室里贴近坐着在说话，我正要退出，聂帅招手叫我坐在旁边听听，他们继续在谈着，叶剑英说：‘……现在他是利令智昏了，他人长、脚长，手也伸得长了！’聂荣臻说：‘坏事就坏在他手长上！’我知道是在说谁，罗瑞卿个子高，毛主席叫他‘罗长子’。没多久外面有动静，他们收住了谈话，叶对我叮嘱：‘我们谈的事，你听得懂，将来我们还会对你说更多的问题。’我知道聂荣臻、叶剑英对罗瑞卿很有意见。但他们毫不掩饰地对我说出来，这是第一次。

“1965年8月间，叶剑英叫我到 he 家里，说：‘我才从大连林总那儿回来，我们谈了很多罗长子的问题。’叶剑英看到我感到惊讶，就详细谈开了，说林彪和他都认为，罗瑞卿的官大了、权大了，人变了。当初还注意自己参谋长的身份，可现在专横霸道，独揽大权，俨然已是军队统帅了。叶剑英对罗瑞卿心目中没有他很气愤，说罗很会装自己的腰包。我（叶）管军事训练，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训练法，罗没在意，后来毛主席作了很好的批示，罗长子就打我的主意。他在全军大搞了一场开展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在南京召开现场会议，兴师动众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

“叶剑英说：罗瑞卿利用贺龙搞小圈子，把杨成武、李天佑、邱会作、吴法宪等人放到圈子外。林总去大连休养之前，同罗瑞卿谈过一次，要他注意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位的；二是要多团结一些人。罗瑞卿对林总的话不以为然。我已经和聂总、刘帅他们谈过对罗瑞卿的看法，我们有共同的认识：罗急于想上台，把‘宝’压在林总身体不好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回顾》，页467—468）

这实际上是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打招呼，开始采取倒罗的步骤。叶剑英称，这是毛泽东的交代，“打招呼的有杨成武我们几个和各大军区的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叶帅说人还要扩大，让大家不要陷到贺、罗的圈子里去。”（《回顾》，页468）

第五、批罗不许批贺。无论是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还是1966年3月的北京会议，军内对罗瑞卿的批判都没有涉及贺龙。邱会作说：“会议表面上是一致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而事实上还有林彪、贺龙两派军内势力的较劲。经过批判罗瑞卿，林彪这边力量加强了，贺龙那边有影响的人物不少，但政治力量就弱了。贺龙在元帅中很孤立，他和罗瑞卿的关系，是他得罪了其他元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次会议再深入，就会遇到贺龙和罗瑞卿的关系问题。不少人想要揭露出来。主持会议的叶剑英说，林彪定下了‘死规矩’，不许涉及贺龙。”（《回顾》，页476）由此可以看出，军内两大派系的较劲当中，林彪还是十分注意分寸的。在这一斗争中，由于林彪的“死规定”，贺龙没有受到牵连。实际上是林彪保护贺龙过了关。

第六、叶剑英在批罗中的作用。在军中倒罗事件中，叶剑英自始至终都亲身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恰恰是国内党史学界隐匿不谈的。大陆官方公开出版的《叶剑英传》、《叶剑英年谱》以及有关叶剑英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完全付诸阙如。叶剑英不仅很早就是倒罗的积极人物，传达、布置毛泽东的意旨，向军中诸将打招呼，而且还是上海批罗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北京批罗会议的组织者。上海会议时，叶剑英就对看望他的军内将领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做嘛，罗长子对你们要客气一点，否则对工作不利。可是他对我这个‘光杆’就不客气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要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回顾》，页470）北京会议上，叶剑英作了长篇总结发言，叶说：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

建议。差不多全部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行百里者半九十。晚节末路之难也如此。罗瑞卿同志的晚节不能保全，对我们是个极大的教训……人要是有了私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没有公心，还会发展为野心，罗瑞卿这样的人也不例外。罗是利令智昏，错误地估计形势而垮台的。（《回顾》，页479）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改辛弃疾词曰：将军一跳身名裂。可见，叶剑英当时的心情和态度。1966年4月，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联名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罪行”：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在5月16日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国。1966年5月，叶剑英接任了罗瑞卿军委秘书长一职，成为军中的实权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叶剑英积极倒罗所得到的政治上的酬佣。

### 简短的总结

笔者以上所谈仅仅是笔者就中共若干历史问题有感而发。其实，《回顾》还有很多其他的亮点。比如，红军后勤工作的起源、演变和发展过程，这是以往的党史书籍中所没有涉及的，《回顾》一书作了很好的诠释，填补了一项空白。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互动，联合，以及中共七大的召开。此外，1959年林彪上台后，中国国防战略的转变，国防建设的发展，军队的重要改革，全军后勤工作的建设，以及如何搞生产渡过三年的大饥荒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和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另外，《回顾》一书还涉及到了中共一些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荣桓、罗瑞卿等人，邱会作与他们多年的近身接触、交往，使得邱会作对他们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邱会作讲述的他的亲身感受和思考，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史学家都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此书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之处。

~~~~~

【一家之言】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 金冲及 •

〔原编者按：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系列活动第六期于2011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金冲及在这次讲座中，回顾了“新中国的前三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画卷。讲座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反映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那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错在哪里？我们要吸取哪些教训？下面我们摘编讲座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加。）

◇ 毛泽东的心理因素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生，邓小平跟法拉奇的谈话里说了那么几句话，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

为什么毛泽东那时候提出要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在他看来，头脑里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央领导层中，对有的问题的看法也并不完全一致，大家都熟悉的包产到户，批判很突出的一条是“单干风”。当时有的同志提出的还不仅仅是包产到户，提的是分田到户。大家知道包产到户所有制不改变，是管理制度的变化。分田到户，那就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当然提出来的同志也是好心，也是作为权宜的临时措施，但这对毛泽东来讲，这可了不得了。当时国民经济比较快地恢复，毛泽东就感到原来有些人对困难估计得太严重了。

另外，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有很多黑暗面。大家知道他很有名的一段批示，这些黑暗面要被作为一个阶级来打到。他批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时农业机械部的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这一次到洛阳拖拉机厂去蹲点，我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有很多老干部在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他就存在当权的地位，他就可以利用特权为所欲为，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企业就可能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薄一波在信上批，这是个问题，它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者是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就在这个上面批，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种状况不改变，“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打倒。”当时“四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的报告。当时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再次上书，他认为是“翻案风”。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讲，毛泽东曾经跟她说了那样一段话，“我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文革”开始那一年，他73岁，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要防止国家改变颜色，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和几个人讲，刚才讲的干部问题，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也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来揭露，揭露来以后，在他看来，你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它去掉。他还说，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到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所以我们发动红卫兵，让他们年轻时候经过那么一场斗争，当时称为反修的斗争，他们长大了就能够知道中国如何避免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是这样的一套想法，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 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个时候已经进行了“四清”了，搞过一些文化方面的批判了，为什么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认为，这些办法只是枝枝节节，他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

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他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我讲了他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毛泽东犯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第一个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

他把这些问题认为都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尤其是他认为他不在了，今后国家会不会变颜色，大家都熟悉的“5 1 6 通知”里面提到，“混进了党内、政府内、军内、文化界的很多人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分子，有朝一日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改变颜色。”实际上，这种看法完全是混淆是非，是一个错误的估计，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第二个是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但这个黑暗面怎么来消除，这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采取措施，限制消除黑暗的东西。毛泽东当时发动群众，一开始是群众来一个放任自流。大家知道，没有正确的引导，中国6亿人口的国家，那可了不得。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我们的经历可以看到，往往因为在社会上，那时候是社会主义真正特权者人数很有限，无非是待遇高一点儿，有一定特权的，一个是领导干部，另一个是高级知识分子，你现在号召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跟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下好了，以前凡是自己觉得不得志的，几乎都起来了。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爆发。在中国，这种不加引导的放任自流，是非常可怕的。而且野心家就可以在这个里面浑水摸鱼，制造很多事件。毛泽东的那个阶级斗争，想通过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把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等等，完全是错的，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些错误认识，集中地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另外那个时候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由于阶级领导的破坏，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了，也使得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纠正错误，所以导致让悲剧的发展达到一切全民内战，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非常严重。

◇ “潘多拉的盒子”，毛泽东关不上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很完整。凡是看过的文件，画过一道线的都保存着，而且附件都还在，人家的来信、报告，附件也在。那么多的档案看起来，我明白前面他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但很多事情情况的发展，往往并不是他所预期的，甚至于有相反的。

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想到会延长到十年之久，但头儿一开，只能是按局势的发展一步步下去。毛泽东最初的设想是搞到1966年底，到1966年8月，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在这一年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说，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再多一些时间。1967年1月全面夺权开始，他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全面夺权以后，各地的武斗愈演愈烈。

对于武斗，毛泽东很吃惊，他跟很多外宾讲，“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局面失去控制以后，时间越拉越长，到1969年要开九大了，他觉得这是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转折了，所以讨论文件时说，“文革小组不要加上，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但九大不久，九届二中全会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第二年毛泽东又开始病得很厉害。

大家知道，高文谦曾写过一本书《晚年周恩来》，他在序言里面提到，周恩来死后不久，毛泽东就要在中南海放鞭炮。很多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感觉毛泽东是丧尽天良，竟然做这样的事儿。事实是什么样的呢？毛泽东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说，周总理是1976年1月8日去世的，之后毛主席曾报过一次病危。1月底，毛主席对我们说，人家都回去过年了，就你们几个陪我这个病人，你们也拿两个鞭炮去放放。张玉凤说她拿着两个鞭炮去放。高文谦是在造谣吗？他说并没有造谣，周恩来是1976年1月去世的，毛泽东是1月份说让人在中南海放鞭炮。现在很多人搞这些花样，什么手段都有，“谎言说上一百遍就成了真理”。我看，中国人可能习惯了，只要是排成铅字的，就感到是真的，假定有很多人讲，觉得至少是无风不起浪，不会是凭空来的。

□ 原载《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年05月25日

~~~~~

## 【百家争鸣】

### 金冲及先生误读文革

• 陶世龙 •

近日，《金冲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这篇文章正在网上流传，并在人民网一文史频道编辑推荐的文章中位居第二。还有视频（文史大讲堂第六期：新中国前三十年（金冲及））。

文章的摘要说：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我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并非是西方学者才有此看法，应是所有文革参加者都有的体验。中国学者已整理出大量历史记载，研究成果很多。

毛泽东没有感到他的大权旁落吗？

下面这些话都是毛泽东自己讲的——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

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9日）

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1962年8月12日）

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作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1964年12月15日至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作的不太好，就是一、二线的问题。搞一、二线，原来考虑我国的安全问题，并鉴于苏联国内外出现的问题，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搞一、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别的同志处于第一线：刘、邓处在第一线。……过于信任别人。这件事引起警惕是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北京的事连插针的地方也没有。我没办法，中央也没办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有中国学者概括为：

“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捩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里，他明确指责了“1962年的右倾。”这里的“右倾”，主要是指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的。江青在文革初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可见其积怨之深。（《十年文革前期65·11—69·4系年录》周良霄、顾菊英编著）

这些事情我想金先生应该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果真是他的一张大字报就够了吗？

金先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应该很熟悉他们政治运作的规则，毛泽东的威望再高，要罢黜刘少奇也不是一张大字报就可以解决的。即如金先生所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难道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大走资派的刘少奇，能不是他所要除掉的吗？且不要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先是让刘邓派工作组，后又支持受工作组迫害的群众反工作组，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才坐实了刘邓派工作组的错误；之后又经过专案审查，才实现将刘少奇开除出党。

金冲及将毛泽东为什么犯错误解释为“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还有“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把事情归为仅仅是因对若干具体问题判断失误而扩大化和方法问题，而且还用刘少奇把问题看得更严重来给毛泽东垫背。（“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也就是说毛虽有错误，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条路线，还是对的。只要把目标找准确，方法改变一下就行了。

但事情是这样吗？并非如此。如刘源说：“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是阶级分化出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还有何家栋说：“当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毛却指责‘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送进历史博物馆。刘少奇一直坚持并创造性地执行、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思想，取得巨大成功。刘认为，由于土地革命的不彻底，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从土改到四清，刘少奇一直都把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列为大敌，把我党的腐败根源归结于此。”

根据几十年的亲身体验，我认为刘源和何家栋说的符合事实，而金先生虽也讲了毛先生的错误，但未能揭示其要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的错误，决不仅仅是把敌情估计得严重了和方式方法的问题。

几十年的折腾已证明，如果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中国早就走进现代化，

金冲及先生的这些观点，早就有人在传播，由于当前确实存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官僚特权阶层也有出现，他们以为毛泽东的文革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其中许多人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同样将官僚特权阶层与资本主义不加区别，产生泛泛的“仇富”“仇官”的心理。在一些网站上，呼唤再来一次文革，已有一些时间，如不能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据编者介绍，金冲及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而按金先生这篇文章所说，不仅无助于得到正确认识，而由于他的身份，更会使一些人以为回到毛泽东的路线上就好了。当然，此或非金先生本意，但作为一个读者，读后就是有这种感觉。由于并非党史研究者，而有关文革的材料，许多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会有不当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纠正和补充。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